

# 基督教边疆服务研究的构想

杨 天 宏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从1939年开始,到1955年结束,历经战争与国家改制转型,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最能同时反映教会趋重社会福音、追求本色化并将其发展重心从沿海及内地城市向西部边疆转移这三方面变化的重要事件。本文在对既有研究展开学术综述、评价其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构想。

**关键词:**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救赎与自救;研究构想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2-0033-07

2007年是基督教来华200周年。1807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横跨大西洋到纽约,随即泛槎七月,横渡太平洋,抵达广州,踏上中国这块对基督教徒来说既陌生又熟悉的土地。说其陌生,是因为此乃基督教(新教)第一次登陆中国;说其熟悉,是因为在宗教改革、近代基督教产生之前,作为与该教有着深厚渊源关系的早期基督教以及教会分裂之后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已经在中国有了漫长的实践其“救赎”使命的历史。

基督教对“救赎”的阐释从来意见歧出。为较多教派接受的“救赎论”,系11世纪由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提出,后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引申阐释为所谓的“补偿说”。认为人类因其始祖的罪孽而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上帝为维护其尊严和社会正义,必须对之进行惩罚。但上帝的仁慈使之不愿看到人类受罚,而人类自身又无法补偿罪孽,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有一个无罪的人作出牺牲。于是上帝便派自己的独生子基督降世,代人受罚,从而既维护了上帝强调的社会正义,又拯救了人类。其实,人类是否真正具有“原罪”,需要“救赎”,这只是基督教神学或伦理学探讨的问题,“世俗”学者或不参与讨论。然而,近代历史上,中国教会人士作出牺牲奉献,参与社会改造事业以“拯救”社会及民众这一可广义理解为“救赎”的努力,以及可以看做教会“自救”行为的基督教在华发展路向选择及教会对时局变化及改制转型的艰难因应,因其涉及到教、俗两方面的重要历史,却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在发展路径上经历了三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在神学理路上由倾向基本教义的“个人福音”向被认为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社会福音”的转变;二是为体现基督教的“普世性”并因应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从“原生”状态向实现在异国它乡的“本土化”或“本色化”的转变;三是从中国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转向内地甚至边疆少数民族

收稿日期:2008-1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新近完成、将于近期出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课题批号:02EJ001)的终端成果——《战争与改制转型中的中国教会: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1939-1955)》一书的绪论。

作者简介:杨天宏(1951—),男,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教授。

地区寻求发展的转变<sup>①</sup>。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而言,这是三个重要的变化。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几乎所有活动,都与这三个变化有关,是其内在意蕴的外化。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组织发动的边疆服务运动,则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最能同时全面反映这三方面变化的重要事件。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以下简称“总会”)于1927年在上海成立,1937年完成在国民政府的立案手续,成为“国内唯一在中央取得法人资格之基督教会”<sup>②</sup>[1]541[2]。从成立到1949年国家政制发生根本变化,总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宗教与社会活动。参加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差会(mission)计有18个,所属机构共21个大(协)会,直属机构为“两区一部”,即云南、贵州两个宣教区和边疆服务部<sup>③</sup>[3]9-10。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以下简称“边部”),是应抗战建国之需,号召全国青年男女有为之士,到当时称之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服务及福音传播的团体。边部创办于1939年冬,结束于1955年10月31日。总部最初设在成都,先后建立了川西、西康和云南三个服务区,主要在川、康、滇三省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服务及福音传播工作,受益人数约计200万<sup>④</sup>。边疆服务内容广泛,主要包括提高边民精神生活的基督教福音传播,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改善边民物质生活的生计服务,以及解除边民疾病痛苦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些服务工作看似琐细,谋求解决的问题却十分宏大,涉及三个层面问题:一是迫在眉睫的抗战后方建设问题,二是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三是历朝历代一直困扰统治者的汉族政权及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化解即“边务”问题。边疆服务历时16年,前10年遭遇了抗战及国共两党内战的洗礼,后6年恰逢国家政制转型的艰难过渡。这期间,中国教会竭尽心力,对三方面问题的解决均谋有所推进,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直属机构,边部活动的历史堪称总会在政府部门立案之后全部历史的集中体现,是研究总会乃至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理想个案。中华基督教会将自己开展着的服务工作称为“牺牲(或奉献)服务”(dedication service),道明了边疆服务所具有的“救赎”性

质<sup>⑤</sup>。

边部开展服务工作的地域——“边疆”并不限于地理学意义上的诠释。根据时人贾湖亭分类,所谓“边疆”有四重含义:即地理的边疆、经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与文化的边疆。地理、经济及政治上的边疆,其义甚明,少有分歧。“所谓文化上的边疆,乃是就国内若干在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同于汉人之宗族而言,如桂之僮人、滇之夷人、黔之苗人,其距国防线甚远,不能视为地理的边疆,其经济形态,亦多近于粗放农业,亦不能称为经济的边疆,其服膺中央与地方法令甚早,更不能谓为政治的边疆,而以其与汉文化有别,故被视为文化的边疆。”因而所谓“文化的边疆”,实即两个以上“不等式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边际(Culture Margin)<sup>[4]675</sup>。吴文藻认为,“边疆”一词“主要不出两种用意: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sup>[5]</sup>。李安宅则观察注意到,就地理而论,中国东南沿海各省虽位于“边界”却算不得“边疆”,“而西北南三方的新疆、蒙古、西藏同样到了边界,则又算作边疆,甚至于国土中心如川、甘、青、康的交界藏名安多区者,在四川有松潘、茂县、汶川、理番、懋功之类……也都成了边疆”<sup>[6]1</sup>。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如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即国界,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诚以农耕畜牧之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sup>[7]</sup>。本课题研究的是作为边部开展社会服务及福音传播区域的“边疆”,与李安宅界定的偏重文化意义的“边疆”相类,系特指虽不属于边境地区,却在地理位置和行政管辖范围上距离行政“中心”较远、在文化上与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正统”文化有所区别的四川西北、西康及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并非泛指可以划归“边疆”的全部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区域。这些地方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并不一定处于疆土边界,但因所居民族语言、文字、宗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均与内地迥异,囿于传统的“文”“野”之分,也就被视为“边疆”了。

边疆服务运动虽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地理与文化区域,但影响却十分巨大。余牧人在《抗战八年来

的中国教会》一文中指出,边疆服务是“教会在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种新工作,对教会,对国家,都有莫大的贡献”,代表了“中国教会今后的工作路向”<sup>[8]</sup>。沈亚伦认为,基督教 1911 至 1950 年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其中 1937 至 1949 年是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坚忍”期,认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这一时期救护难民、服务伤兵的活动及边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服务工作,是基督教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值得纪念”的“大事”,是一项在“艰难中产生的事工,实在是可宝贵的”<sup>[1]545-546</sup>。《中华年鉴》甚至将边疆服务纳入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搞得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的范畴,加以肯定<sup>[9]89</sup>。1943 年 10 月,一封涉及边疆服务的信件对边部工作作了如下分析评价:“基督教的布道合作(Christian Occupational Cooperatives)是当今中国教会最重要的发展变化之一。这项事业是基于如下信念,即如果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则不如让他因饥饿而逝去。合作计划是将身体与灵魂的拯救结合在一起,使之能在基督精神信仰和基督教生活方式的连接下生长。Mrs. Birkel 称,在她待在中国的全部岁月里,她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计划如同边疆服务那样,产生了福音传播的良好效果。”<sup>⑥</sup>从世界教会史的立场审视,边疆服务的内涵更加丰富。耶鲁大学神学院所藏《中国基督教会的新时代》一文,对边疆服务作了如下评价:

促成这一时代进步的机构已经以边疆服务部的组织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一些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甚至认为它包含了 20 世纪亚洲国家发展的基本模式。边部现在处于无与伦比的重要位置,因为它提供了中国教会所选择的各宗派及国际间合作最早的适用原则。此外,鉴于所处之特殊地位,边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堪称独一无二,因为中华基督教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代表了中国五分之三的新教徒,参与指导中国人的共和观念。由于这两层因素,加之面临新的机遇以及为寻求发展而在数千里中国边疆拓展时与外部发生的接触,边部在世界教会所承担的使命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由于中国在亚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领导地位,而亚洲拥有世界人口之半,因而中华基督教会的服务计划必将发挥重要的国际影响。<sup>⑦</sup>

尽管评价有所溢美,甚至引证的数据也不甚准确,但事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然而,对这一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既有学术研究却难饜人望。刘吉西等编写的《四川基督教》是迄今所能检阅到的对边部活动叙述最为完整的著作<sup>⑧[10]</sup>。该书叙述了边部创建的过程、经费来源、办事处的变迁、三个服务区的设置及具体服务事工、边部开展的研究工作、大学生暑期服务以及边部工作的结束等,并附录有川西、西康两服务区各类服务点一览表、分布图和边部工作人员名单。但该书在叙述边部各服务点活动时,内容粗疏,且大体是静止地叙述运动在某一具体时段的状况,缺乏对事物变化的整体性描述。其所列图表既没反映出各服务点开办、结束时间,也没说明各点的开办形式,对一些重要服务点的并转情况,也没有提供必要的理解线索,甚至连边部工作人员也未能全部囊括在名单中,加之涉及边部活动的篇幅仅 1 万余字,内涵有限,因而留下诸多缺憾,有待弥补。

秦和平教授著《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sup>[2]</sup>系对边疆服务作了较为详细阐述的另一要著。该书设置有专门章节讨论边部活动,对边疆服务的由来、各服务区的服务工作分别进行叙述,并对边部的宗教活动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但该书也不无缺憾。从根本上言,该书涉及边疆服务的内容仅限于单纯纪事,较少注意相关问题的探讨。在内容处理上,该书对基督教福音传播及教育服务阐述较为翔实,在医疗卫生及生计事业方面则略嫌简略,对 1949 年以后的边部历史则基本没有涉及。此外,该书只涉及基督教在四川的传播活动,至于边部在云南的活动,则只提及在富民和寻甸地区有边疆服务部的传教活动,究竟开办了什么服务事业,却只字未提,因而难以透过该书窥见边部的全部服务活动。

顾卫民、姚民权、罗伟虹、杨学政、韩军学等人的著作有一定篇幅涉及到了边疆服务,其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认识边疆服务的宏观背景,但对边疆服务的具体史实或语焉不详,或存在判断错误,参考价值受到影响<sup>⑨[11]515-516[12-14]</sup>。

就相关学术论文来看,数量也十分有限。沈亚伦《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一文较为准确地概述了包括边部活动在内的基督教在 1911 至 1949 年这 40 年的发展历程,尽管对边疆服务活动所作评介

略带教内人士特有的感情色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sup>[1]533-551</sup>。李传斌著《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sup>[15]</sup>及刘家峰著《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sup>[16]</sup>系两篇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博士论文,虽未涉及边部历史,但对于认识了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发展脉络及基督教开拓服务区的历史传承,仍然有所裨益。

除了上述论著之外,边部活动区域的地方志有关基督教的章节亦记录了边疆服务部的活动<sup>⑩[17-19]</sup>。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不仅问题发掘欠深入,就连历史文献搜集整理的功夫也做得不够。这种状况给企图深入发掘事件内涵的学者带来了借鉴上的困难,同时也为研究者预留了进一步从事学术探索的广阔空间。

鉴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尚十分薄弱,本课题研究将沿袭作者既定的研究思路,将主要精力用于相关历史事实的重建(reconstruction),强调把对历史现象的思考置于事实建构的过程中,把脱离了事实客体的形上分析视为非历史学的思辨,对之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因而,本课题研究思考的问题均为实证性的。作为题中应有之义,本课题研究者必须直接回答的问题包括:边疆服务运动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边部作为教会组建的社会服务机构,其具体运作方式如何,开展的服务工作具有何等内涵?取得了哪些成就,对边胞及边地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运动的最终结局如何?留下了哪些历史经验与教训?如果作较深层次的探究,则以下问题也在作者思考范围之内:基督教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社会转型时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本色化”在不同时期是否具有不同的内涵?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基督教福音传播之间的兼容性究竟如何?在信仰上处于佛教及传统巫术盛行状态下的边民对基督教究竟持何等态度?边疆服务是否揭示了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边务”问题的新的解决方式?对于方兴未艾的“边政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哪些操作层面的支撑?边疆研究与边疆服务究竟是如何互动的?国共两党先后建立的政权对待基督教的政策具有什么样的联系与区别?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与前途究竟如何?等等。如果将全部思考聚焦到一处,作者所欲回答的

问题将是,在华基督教是否实现了所设定的“救赎”和“自救”目标?

这样一种标榜实证、实则已迹近琐碎的问题探讨使作者不得不在理论及方法上作一番辩解。在理论与方法上,本课题研究没有体现什么值得炫耀的“新东西”,但我并不以为学术上别出心裁的新玩意就一定比传承已久的存在更具传世价值。这些年来,学人趋新、趋西,外来的理论方法让人目不暇接。厕身学界,学者常常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所有学者的努力都是在将历史这门“学科”做得具有“科学”特征,好像唯有如此,方能为历史学在林林总总的众多学科中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应当承认,正是由于科学方法的传入,中国传统史学方得以从单纯叙事升华到问题研究的境界,逐渐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长足进展才有了一个新的基础。然而,“科学”方法被引入历史学,除了导致这一重要变化之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不利于史学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发育生长的因素。这或许并不完全是科学本身的过错,而是研究者片面理解“科学”与“科学方法”所造成的偏差。在基本质点上,科学方法可以分为分析与归纳两类。分析法偏重于以已知的宏观规律或结论作为“理论”来解析具体事物;归纳法则偏重于从具体的事物推导出未知的宏观结论。两种方法各具功效,均为认识客观世界的有效方法。但比较而言,归纳法更能够产生新知,是发挥创造性思维的有效方法。这一点,已经为中外学者普遍体认。

然而,由于统摄天地万物的“道”早已被古圣先贤揭示,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人敢轻易去质疑“道”的合理性;近代以来,意识形态复设下众多规范,不能随意触动,更不容许普通人有理论建树。因而,讲究“科学”的国人在方法上大多走上了分析的路径,于归纳法则不甚措意。近年来,又有“结构主义”充斥盛行,对一切事物都要下一番“解构”的功夫。以我的陋见,“解构”在本质上亦属分析,于是分析法被推上极致。分析法对历史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将过去囫囵吞枣的研究引向精密化,最大的缺陷在于容易将史学研究引向“无形化”,即导致研究客体外在形态的消失。而一旦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形态上消失,“分析”一词也就成了“分崩离析”的缩略语,“解构”则成了类似庖丁解牛的操作技巧表演,虽于牛的骨骼肌肤构造掌握精确,达到出神入化、杀

百牛不折一刃的境地,却留下了“未见全牛”的遗憾。我的努力就是要在人们竞相用其片面理解的西方“科学方法”来解析“牛”,却忽略了“牛”的整体形态之时,用或许并不“科学”的方法,通过事实描述,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已经被他人肢解、弄得面目全非的“牛”的体态及面貌,并以此为基础,归纳推导出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际遇及其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社会所构成的复杂关联性。

对“边缘”地带、“边缘”社团及“边缘”人物的关注是本课题研究的重心所在。中国地域辽阔,社会构成多元,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加之来自西方的“冲击”首先涉及沿海地区,内地的变化未能同步,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形同化外,因而研究意义上完整划一的“中国”实际是不存在的,所能看到的只是具有“多个世界”划分的清季或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版图。通常,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研究都习惯于关注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地带,边缘地区则往往被置诸可有可无之列。但是,依据单一“中心”地带得出的研究结论来形状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在逻辑上是不周沿的。西方学者柯文(Paul Cohen)主张以“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取向取代既有的近世中国史研究中曾被广为接受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一定程度上乃是基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外来影响有限的考虑<sup>①[20]2-6[21]</sup>。某种意义上,这一取径的转变,也是西方主流派的“中国学”学者对忽略中国内地及边疆的片面的“中国学”研究的反省。但中国自身的近世史研究,恕我直言,至少自认为居于“主流”地位的一派,却在很大程度上将目光滞留在自以为得计的对“中心”地区的事件及人物研究的层面。在他们的学术“关键词”(keywords)中是没有“边疆”的,似乎“边缘”地区及“边缘人物”的研究只是应该交由“边缘学者”去干的吃力而不讨好的工作。这无疑影响到了完整的近代中国历史的事实重建和诠释水平。

就中国基督教及教会历史的研究而言,迄今为止,研究者大多比较关注诸如神学、宗教哲学及精神

道德等层面的分析,而忽略了教会开展的“世俗”的社会事工,至于教会社会下层尤其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事工,则更是难以进入“主流”学者的学术视野。在我作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参加的几次全国宗教学会学术研讨会上,亦强烈感受到了研究者的这一取向。我不明白,研究者为何总是热衷于抽象的学理思考而忽略了具体的事实建构?为什么只有被视为“中心”的历史存在才能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难道唯有如此才足以显示研究者的水平?离开了唯一可以作为理论支撑的事实,学理研究的价值究竟何在?没有“边缘”,所谓“中心”还能够存在吗?我不讳言,我在这一课题研究中使用的对边部工作琐事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所作不厌其详的场景实录和细节描述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既有研究方法的怀疑而特意采择的。

所幸的是我的想法并非没有同道与知音。2002年秋,这一课题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立项。很可能课题评审人正是看到了我在申请报告中强调的方法与学者通常的做法有所不同才投下了支持票,这更增加了我的自信。课题立项之后,我很快着手搜集相关史料,积累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信息和学术思想。经过近5年的调查研究和伏案工作,终于初步完成这项课题研究<sup>②</sup>。

不过,尽管在学术上有自己的判断,但对课题所涉及的诸多领域知识背景的把握,我却不敢自是。我接受过基础训练的学术领域主要是中国历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并非我的专长。相对于长期从事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学者而言,我至多只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 at the gate)。在过去的学术经历中,我曾有幸得到众多师长和同辈学者的提携扶持。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我真诚地希望能够在师友们不舍不弃的帮助下,最终跨入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学术大门,并升堂入室,窥其奥秘,与我一直十分敬重但对其学术见解却不尽认同的从事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学者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共同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宗派分野,不同教派在这些问题上尚存在不同的取舍差异,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教派不一定认同社会福音,但社会福音一度成为中国教会的主流取向,则应当没有太大的异议。

②沈亚伦著《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称总会成立时间为1927年;在诚静怡的追悼会上,张伯怀称总会成立的时间是民国

- 16年,即1927年;秦和平在《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中也称其成立时间为1927年。但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向四川省社会处“呈请签核备案”,缕述总会成立前后经过情形时,称总会成立于1926年(参见《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前后经过情形、公报》,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社会处档案,全宗号:民186,目录号:2,案卷号:1835)。此处暂从前的说。
- ③这18个差会包括:加拿大合一教会、加拿大合一教会女宣道会、加拿大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女宣道会、美国公理会、美国南长老会、美国北长老会、复初会、归正会、同寅会、伦敦会、英浸礼会、英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纽西兰长老会、澳洲长老会、瑞典长老会等。参见《公报》1949年1月号,转引自《四川省西昌专区基督教教会简史》,第9-10页。
- ④边部在解放初期接受调查时所作登记称:“本部现有工作之主要服务对象为川、康两省边界文化落后生活贫苦的少数民族如羌戎番(川西区)及彝族(宁属)等,计人数在二百万之谱。”所说的人数应为直接及间接受益人数之总和。参见《国际性救济福利团体调查提纲》,四川省档案馆:宗教事务处档案,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5。
- ⑤耶鲁大学神学院藏边部档案:Annual Report of the Work of 1945,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Shiao Sih Bah, Kuming. 4-5 (17-19)。
- ⑥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Archie R. Crouch Is Returning to China Mission Field, The Cambian, Nov. 25, 1943, Box 1 Folder 15. 案:“Christian Occupation”直译为“基督教占领”,但也可以翻译成“皈依基督”,如“中华归主”就是这种译法。本书译为“布道”,系采用后一译法而略加变通。另案:张伯怀在致柯乐智的信函中称,当时中国新教徒的数量为50万人,中华基督教会的成员为16万人,这两个数据都是准确的;但所称中华基督教会代表了中国3/5的新教徒,则明显是计算错误。参见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W. B. Djang to Archie R. Crouch, August 6, 1947, box 1-24。
- ⑦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New Age for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Importance of the 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to this Era. Box 2-47, 001。
- ⑧参见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第454-474页及该书其它相关章节。
- ⑨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设有“外患与内战中的教会”一章,记述了中日战争中基督教在沦陷区的艰难处境。顾氏认为,在大后方的教会事工中,“边疆服务”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因而简要记述了边部的成立原由、经过、宗旨及下属服务区。但该书只提及边部设立的川西区和西康区,未涉及云南区,此其不完备之一;此外,该书对各服务区的服务事工分类不明确,将医药和教育事工笼而统之归为一类,对生产事工则未提及,此其不完备之二。有此两点,其不能反映边疆服务活动的整体状况甚明。姚民权、罗伟虹著《中国基督教简史》一书对边部活动也有所反映。该书第七章《外患内战时期的基督教会》称: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抗战期间组织了“负伤将士服务会”以救护伤兵,后该会“改为了‘边疆服务部’,在云贵地区为内地流亡学生服务”。该书作者非但没弄清楚边部的成立缘由及经过,而且连边部的服务区域、服务对象也张冠李戴,完全弄错,其价值可以想见。杨学政主编的《云南宗教史》虽有专门章节提及“中华基督教会”在云南的传教概况,但仅百余字,难以借窥边部在云南的具体活动。韩军学著《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一书注意到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寻甸苗族地区的传教活动,但仅寥寥数语,基本未涉及边部及边疆服务的史实。
- ⑩比如:1941年出版的《西昌县志》,因编纂时正当边部活动肇始期,以至边部的成立经过、开办的服务事业均未提及。除此而外,1996年出版的《西昌市志》对边部西康区部的服务作了介绍,但过于简略;《西昌市文史资料》第10辑所收录的由边部活动参与者洗崇光等人撰写的《西昌基督教简史》,较为准确地记载了边疆服务部在西昌的服务活动,但因系“基督教简史”之缘故,该书于西昌基督教的传承着墨较多,对边部在该地区的具体服务事工着墨较少,让人难窥边部在当地活动之全貌;另外,汶川县志、阿坝州志、理县志及各该州县文史资料都曾提到边疆服务部在该区的活动,虽记述简略,亦可资参考。
- ⑪参阅(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第2-6页。夏明方教授《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困境》一文对柯文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两人的分歧系着眼点或学术立场不同所致。柯文针对的是美国或西方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体现的西方中心倾向,有意矫其枉,故有“在中国发现历史”之论。而夏明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学者对柯文文本的误读以及导致误读的柯文论证的不周沿。尽管柯文的论述并不十分高明,但其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论述却堪称精到,因而具有参考价值,故我愿意参考柯文的意见。
- ⑫承担课题之初,我正担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行政工作繁琐,不能以大部精力从事研究,遂指导研究生汪洪亮、邓杰围绕这一课题,写出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他们搜集的部分资料以及所作的前期研究,为我深入展开问题思考作了良好铺垫。虽然他们的论文都曾经过我逐字逐句反复修改,部分重要的思想见解也系我提供,搜集资料所需资金也大多由我承担,但他们为此付出的劳作仍然是巨大的。一定程度上,本书可说是我们共同的学术成果,其中汪洪亮所作贡献尤多。具体言之,本书涉及教育、生计服务方面的部分原始素材,系借取了汪洪亮的研究成果;涉及医疗卫生服务的部分原始素材,系借取了邓杰的研究成果。由于行政工作非我所爱亦非我所长,在担任行政职务的数年间,自我感觉在学术领域

已经处于“业余”的工作状态,时常有一种将被学界疏离的感觉,心中不免忐忑。2005年春,在一届任期结束之时,遂辞去所担任的行政职务,受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新开始,潜心学术,经3年努力,方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沈亚伦. 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M]//张西平,卓新平. 本色之探.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 [2] 秦和平. 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 [3]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调查组. 四川省西昌专区基督教教会简史(内部参考资料)[M]. 1960.
- [4] 贾湖亭. 论我国半世纪以来之边疆政策[C]//张其昀. 边疆论文集. 1966.
- [5] 吴文藻. 边政学发凡[J]. 边政公论,1941,1(5-6).
- [6] 李安宅. 边疆社会工作[M]. 北京:中华书局,1944.
- [7] 李安宅. 实地研究与边疆[J]. 边疆通讯,1942,1(1):1.
- [8] 余牧人. 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J]. 基督教丛刊,1945,(9):9-11.
- [9] Chi-hsien Chang(张启贤). *Religion, The Chinese Year Book(1940-1941)* [M].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China, 1942.
- [10] 刘吉西,等. 四川基督教[M]. 成都:巴蜀书社,1992.
- [11]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12] 姚民权,罗伟虹. 中国基督教简史[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 [13] 杨学政. 云南宗教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4] 韩军学. 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15] 李传斌. 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D]. 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收藏.
- [16] 刘家峰.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收藏.
- [17] 西昌县志[M]. 郭少成等修. 1941.
- [18] 西昌市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19] 洗崇光,余松芝,陆宗祺. 西昌基督教简介[G]//西昌市文史资料:第10辑. 1989.
- [20] (美)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 林同奇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1] 夏明方. 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困境[J]. 近代史研究,2007,(1).

## Christian Border Service Study Concept

YANG Tian-hong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border service movement from 1939 to 1955 initiated by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goes through wars and state politic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history in China that simultaneously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church's increasing emphasis on social gospel, pursuit of loc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focus transfer from coastal cities to hinterland and west borderland. Based on a survey and comment of the accomplished studies this article comes up with a study concept for the subject.

**Key words:** Christian missionary history in China;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border service movement; salvation, atonement and self-providence; study concept

[责任编辑:凌兴珍]